

# 傷 害

趙文滔 著

(修訂本)

Hafaiy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Ltd.

# 傷害

赵文滔 著

夏菲尔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 **INJURE**

BY WEN TAO ZHAO

---

**Published by Hafaiy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Ltd.**

**P.O.Box 47497 , Morrison Hill Post Office,**

**Wanchai, Hong Kong**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伤 害 (修订本)**

---

著 作 者: 赵文滔

责任编辑: 江 海

编辑出版: 夏菲尔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摩利臣山邮政信箱47497号

电话: 852—2838 6492 传真: 852—2834 8703

**E-mail: [frontline\\_mag@hotmail.com](mailto:frontline_mag@hotmail.com)**

承 印: 大洋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009年4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2012年9月(修订本)第一次印刷

---

国际书号: **ISBN 962-938-065-X**

## 目 录

---

序 .....	朱 正(1)
读《伤害》后想到的 .....	孙觉民(6)
走近懵懂 .....	(8)
整风 .....	(27)
阳谋?阴谋? .....	(41)
劳动驿站 .....	(54)
从拓荒到大跃进 .....	(72)
魂断于家岭 .....	(90)
走出大墙 .....	(122)
逃离死亡——回家 .....	(140)
黑色风暴 .....	(156)
鲁班门下 .....	(170)
残酷的株连 .....	(182)
沾了尼克松的光 .....	(190)
新词儿——“改正” .....	(200)
罪恶的档案 .....	(214)
十年琐记 .....	(222)
四十二年才有了“改正书” .....	(233)
半个世纪的一次通信 .....	(239)
思索·良知·罪恶 .....	(255)
后记 .....	(282)

## 序

朱 正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的五十周年。许多人都在反思这一历史事件。像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就上书要求对此重新评价,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朱厚泽撰文论证反右派斗争对中共自身也是一场巨大的伤害。在民间,更有一些自发的纪念活动,好些地方都有当年的受难者发动签名,或者要求经济上的赔偿,或者要求对这事的是非“给一个说法”。正好在这时候,赵文滔兄的这本回忆录脱稿了,赶上了这五十周年纪念。

文滔兄写的,是他个人几十年间的遭遇、见闻,以及他对这些的思考,却生动而且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线。书中写的第一个政治运动是反胡风和紧接着的肃反运动。这是反右派斗争之前的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最大迫害。这一场运动打击面广,(据胡乔木撰写的《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社论提供的数字,立案审查达一百四十万人),错案率高(据前引社论,错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到了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对胡风一案和肃反运动的质疑就成了一个议论纷纷的热门话题,而那些诉说冤苦的肃反对象,就成了右派分子的一大来源。

那时,文滔兄在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工作。那里的肃反运动是怎样进行的呢?一位在美国留学,学兵工专业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分配在二机部所属的学校里任教。肃反运动中被定为“特务分子”,关起来整了好久,和他一同从美国回来的妻子经受不起这折腾,抛下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自缢身亡了。在机关宿舍里,还发生了跳楼自杀的

事。

就说他们这个教育司，不过三十来个人，就“肃”出两个“汉奸”来。文滔兄当时就提出了质疑：1945年日本投降以前才会有汉奸，日本投降以后就不能再有汉奸了。现在的这一名肃反对象，在1945年才十岁，他能当什么汉奸呢？可是党支部书记却认为文滔兄的这发言“对运动起了极坏的作用”。

在肃反运动中，有一些在校大学生也受到审查。二机部决定，所属六所院校里学生中的肃反对象，一律强行转学到其他非国防性质的院校去学习。有的已经三年级了，专业课都差不多学完了，也不管。这不但对这些学生是一大损害，对于国家的教育资源也是一大浪费。

就是文滔兄自己，也是很有成为一名肃反对象的危险的。教育司的党支部书记就一心想把他做成一名胡风分子。他看见文滔兄在看契诃夫的小说，就追问：这齐合夫同胡风是什么关系？你看过胡风的书吗？你认识和胡风集团有关的人吗？

文滔兄躲过了肃反运动这一关，却没有能躲过反右派斗争这一关。就凭了整风期间他写的三张大字报，给他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读者可以在本书中看到这三张大字报的存底，他都说了些什么啊？他批评了高级干部的特权，如用大笔公款装修自己的住宅，考不上大学的子女可以免试入学，小干部因“流氓行为”开除团籍者有之、判徒刑的有之。而一名副局长诱奸了二三十个女人却还有人为他辩解。他批评了教育司肃反运动的偏差。就凭着这三张大字报，文滔兄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这以后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里，成了可以任人欺凌侮辱的政治贱民。

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虽说只戴在他一人的头上，那重量却是必须由全家分担着的。第一个受到连累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任教的妻子，学校里给她开了几次批斗会，贴出了批判她的大字报，还把她的教研组长职务给撤了。正在天津大学机械系二年级的弟弟也受到了株

连,一份黑材料放进了他档案袋里跟随了他二十年,使他要调动工作都找不到愿意接受的单位。还有原来在太原教书的姐姐,也因为弟弟是右派的缘故,在文革中下放农村,小孩跟着下去,学业也荒废了。

文滔兄所受的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使他深思了“劳动教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说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条制定的,而《宪法》这一条的原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完全不能援引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根据。国务院的这一决定是对《宪法》第一百条的文字和精神明目张胆的曲解。相反,《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劳动教养,就是绕开法律程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手段,是完全违宪的。

文滔兄在书中记下了他在清河农场三分场和于家岭分场劳动教养的情形。每天劳动时间之长,劳动艰苦繁重的程度,书中都有很具体的描写。他引用了德国哲学家和法律思想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一段话:

刑罚是一种报复。罪犯劳动,实际上主要是以德治和折磨犯人为目的的劳役、苦役。

……其劳动仍然是对肉体的摧残,也是对精神上的折磨。因此,仍然是不符合人性的,不人道的。

我可以以当年劳教人员的资格作证,黑格尔说得十分中肯。叫我们干的,并不是以创造财富为目的的通常意义的劳动,而完全是一种让你不堪承受的惩罚。

就在把这些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的时候,“大跃进”开始了。这两件事,不仅是在时间上是同时发生的,而且有内在的深刻的联系。可以说,“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最直接的后果。毛泽东 1958 年 9 月 5 日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事实正像他说的一样，这时，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意见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剥夺了发言权。种种离奇的幻想都可以付诸实施了。文滔兄的书中举了一个清河农场旱地改水田事例：把六千亩眼看就可以收割的小麦犁掉作肥料，不计工本地投入大量劳动把它改造成水田，播下一百万斤稻种。结果是颗粒无收！这不过是全国许多类似事例中的一例。“大跃进”造成了对农业、畜牧业的大破坏，接踵而来的就是大灾荒，大饥馑，大死亡。在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除了苦役的惩罚之外，又补充了另外一种更加难以忍受的饥饿的惩罚，真是雪上加霜。当时饥饿的程度，人们在饿死边缘的种种反常的表现，书中都有极其具体的描写。在农场，没有病死的人，只有饿死的人。据估算，农场右派分子饿死的差不多有四分之一。这真是一叶惨绝人寰的历史。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林林总总的人物群像。像郭荣昌，这时候他已经是山西省外贸局的副局长了。他经过许多周折找到了文滔兄，想帮助一下这个过去的同事改善一下处境，可是办不到。后来文滔兄作了木工，也遇到了不少好心人，像史建德、仲连顺、顾静华、张学禄、吴士孝，……他们正直，善良，有是非之心，都给了受难中的文滔兄不少的照顾和应有的尊重。这样的好心人，就是在农场的管教队长中也是有的。一位张姓的队长表示，知道这些右派分子“犯的是言论错误”，不过，“我当个队长，权限有限，有的事在我的职权范围内的，我会帮助你。”他还真说到做到，后来总场批准一批人回家养病，他就趁此把文滔兄放回家去了。

书中也写了另外一种人，那些丧尽天良的打手。这种人，在平日，业务工作什么也做不好，一到政治运动来了，他们就精神百倍，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就凭着这种积极表现，升官发财。像当年划他右派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做到了中共郑州市委统战部长，一位反右时给他无



限上纲的打手,后来做到了北京市高教局大学处处长,另一位打手在一个什么单位当上了人事处长。既然当打手有利可图,当然在运动中勇于冲锋陷阵,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敢做了。这样他们也就成了这种体制今天的社会基础。腐败,低效率,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要治愈这痼疾,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辨明历史的是非。讳疾忌医,就无法救治了。

文滔兄是一位有历史使命感的人,发愤写了这本书,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实的记录。写的虽然只是个人的经历,但是从一滴水可以看见一个世界,其中包含了许多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按其这一性质来说,也可以称为“资治通鉴”的。我希望有更多的难友也像文滔兄一样,写出各人的回忆和思考,作为我们对社会,对国家最后的回报。

二〇〇七年五月十八日于北京旅次

## 读《伤害》所想到的

孙觉民

人老了最喜欢回忆过去，过去的事是喜，是忧，是痛，是苦，是甜，是涩，是过关斩将，还是麦城败北，都会展现在记忆的心扉里，一幕一幕，像连续剧一样演映。

回忆是最珍贵的财富，特别是对于颇有阅历的人更是如此。这笔财富不仅属于自己，如果连缀成文，编辑成书，奉献给社会也是功德无量的。

作者八十高龄，他以耄耋之年，弱病之躯在电脑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了近二十万字的回忆录——《伤害》。记述自己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这个沉重的饱含辛酸的故事，只是五十五万个不幸者和他们家庭亲属遭遇的一个侧面，一个片断，但也真实、具体地反映了我们共和国历史上最悲痛的一页——“反右派斗争”。

作者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他思想开阔，专业扎实，热情奔放，毕业后正信心百倍地投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之时，谁知风云突变，一夜之间从美好的人间跌进深不可测的地狱。从此，炼狱之灾，炼狱之苦，命运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些故事，令人费解之处在于，这么多“右派分子”不是被外部的敌人，而是被他们信赖的党“引蛇出洞”揪出来打翻在地的。这群人从此脸上、心上都打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烙印。报上有名，广播有声，臭名远扬，家喻户晓。每个人档案袋里无一例外被塞进一卷黑材料，魔影伴随终生。摘帽以后，仍被称为“摘帽右派”，政治歧视没完没了。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水浒传》中的“林冲发配”的场面，林冲和其他面烫金印的发配者，充其量也是“个案”，而我们则是五十五万，二十二年的千古奇冤。“反右”打击面之大，株连之广，社会影响之深，可谓大矣哉！

1957年，他还是个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幼稚、单纯、天真无邪，党让帮助整风，自然积极响应，必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所知所感

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他那里知道这是“上边”特意下的套，请君入瓮，让你挨整，岂有他哉！

从他被错划的依据来说，只有三条，哪一条不是出于善意？哪一条够得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说我们现在感到这原由太荒唐，太可笑，就在当时，有良知的人也心知肚明，虽知不对也不能说，不敢说。在批斗中，说你是啥就是啥，谁敢辩解？最后，就按这荒唐的理由，把一个朝气蓬勃的有为青年打成“右派”，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让他在炼狱中悔改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罪行”。庐山会议上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不也是只有挨批之功，无有申诉之权吗？彭老总性格倔强，面对“钦定”大案，他也只得俯首听命。

对于“反右派”，中央已经作了结论：“扩大化”，并归咎于领导决策失误。其实单位领导也不能没有干系。第二机械部属于国务院的部级单位，在反右运动中的政策掌握显然荒诞，根本原因恐怕在于体制、运行机制和人员水平。

1978年“右派”改正时，作者已经从一个二十八、九岁，风华正茂，出成绩，创业绩的黄金时段沦落到了知天命之年，宝贵的青春年华已经付诸东流。对他自己，对国家、社会都是巨大的损失。

我的这位老同学多年来总有一个心愿，要把这一段不幸的历史写出来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世人，让大家都记住这沉痛的教训。在他八十高龄之际，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断断续续，终于在夕照余辉里写出了他的回忆录——《伤害》。我鼓励他早日印出，以饷同好。这也是他应有的社会责任，这本书除了反映他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之外，也展现了那个扭曲时代悲剧的形成历程。

我和文滔是总角之交，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寇侵华，我们这群十三、四岁的孩子，背井离乡在一个战时中学由初中读到高中，同住一个宿舍，朝夕相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经历了艰苦生活的磨练。切磋课业之余，也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高中毕业，他去深造，我则投身军旅，作编辑、记者，从朝鲜回来后侧身教育界。我们多年来保持联系，补叙半个多世纪的交往，说明我对这位老同学知之较多、较深，写此读后感当无画蛇添足之嫌也。

## 走近懵懂

人之生也,与忧俱生。

——庄子

1954年底,可能是为了推行中央集权制,中央决定撤销大区政府。因而,我所工作的单位-----政务院(今国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宣告撤销。所有的人员,除了一部分分配华北各省市,极少部分分配西北,绝大部分局、委的人员,都调到国家相关业务的部、委了。惟独我和两位处长被以“支援国防工业建设”的名义,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

我们仨原来在华北行政委员会贸易局工作。高、华两位处长以往一直搞经济工作,我是经济系毕业生,本来我们都可以说是“学以致用”,没想到,来到这个二机部却让我们改行作教育工作。那位华处长脾气挺大,坚决不干,坚持要干就到生产工厂,经过一番吵嚷,最后只好分配他到了618厂(坦克工厂),在生产车间担任了个负责人。高澎处长被分配到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我这个科员则到了部机关的教育司工作。反正都让我们大改行。

我很留恋华北行政委员会的环境和人事关系。机关地处颐和园附近,清静、幽雅,空气清新。那里的人员一半是老干部,一半是51、52、53年毕业的大学生,贸易局160余人各占一半。学生刚参加工作,保持了他们的单纯和真诚;老干部则刚来自老区,依然是革命传统,彼此相处和谐。(从改革开放,恢复了人与人较比正常的关系以来,我们这批当年的老同事尽管大家都成了古稀老人,而且差不多一两年,两三年要因为“走人”而减少参加者,但不管有多少人,每年聚餐两次,一同叙旧,坚持至今,依然保持了纯正而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当时的一批领导干部,作风淳朴,平易近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局长李哲人周六下午从外边回来,他的ЗИМ车驶向楼门口时,我正在门外,车停下来,(那时候老干部都兴“过礼拜六”,夫妻团聚)我知道李局长是接他的夫人来了。车门一开,出来的竟是一位“小脚”老太太。我不由得笑出声来,李局长走过来在我背上拍了一下,说:“小赵,笑什么你?你的思想

有问题,你要懂得这是社会问题,你说说,我要现在离婚,再找个大学生行不行?我不能那样作。你说你这个小年青的,哪儿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思想问题?!你呀!你。”他一边说,一边微笑着走进了楼门。我被他的这一番话说得很是尴尬,不知道如何是好。心想:这一下可把局长给得罪了。忽然他又回头冲我喊道:“小赵,汽车后备箱里有一筐苹果,叫几个人,拿进来给大家分分。”这一来倒给了我一个台阶下。“好了!”我答应一声,忙向汽车跑去。他并没有怪罪我。

后来,单位撤销,李局长调对外贸易部任第一副部长(部长叶季壮长期生病不能上班)。再后来,在冀朝鼎向毛泽东提出,应和资本主义国家也做贸易被斥责后,李哲人又向毛泽东提出和资本主义国家做贸易的建议。(当时中国的外贸只和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做生意,不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这一次惹得毛大怒,责骂李是“曹操”,挨了一顿整。后来调物资部任副部长。文革中,这位工作能力很强,平易近人的好人,被造反派批斗,后患病致死,这些都是后话了。

有一天,我和原来的一位同事一道去我们原来的副局长,后调为商业部部长助理的戴冀农家去,在华北行委时我们很熟,一方面去看看他,另一方面也想和他谈谈我的情况。那时候他住在西四兵马司胡同。当他问起我的情况时,我就把我们大改行的事和高澎处长当了校长的事讲给他听。然后他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可是挑的都是局里的好干部,既然已经调去了,先干着看看,刚到新工作单位就提调动工作的问题不太好。以后再想办法。”接着,他告诉我们,不久,要成立一个城市服务部,他将去那个部担任部长助理。

“城市服务部是搞什么工作?”和我一道去的,原来华北行委的同事老黄问道。

戴助理说:“简单说就是管城市的吃、喝、拉、撒,管的就是什么旅馆啦,饭店啦,等等。说实话,这是新成立的机构,我还没完全搞清楚。”说罢,他笑了。

“哎!你们吃过烤肉没有?”接着他又问我们。

当时我们哪儿吃过烤肉,就老老实实告他说:“没有。”

“走!我今儿个请你们吃烤肉,西单,‘烤肉宛’,咱们这就走。”

我们满以为他要打电话到单位要一辆车,他没有那样作,一边穿衣服,一边说:“走,坐电车!”

因为原来在华北贸易局时,戴局长是单身,常常约我们年轻人一起

出去玩。玩罢,他比大家收入多,也就常常请我们吃东西,付划船费等等,所以他这天提出请我们开荤,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一点没客气。

50年代北京还有有轨电车,戴助理也算年长者,和我们从西四乘着叮叮噹噹的电车到了西单。我第一次到“烤肉宛”这种地方吃饭,好在我们都很熟,戴助理一边给我们讲北京烤肉的特点,我们俩年轻人一边狼吞虎咽地猛吃。看得戴助理直笑,说:“哈!年轻人真行,好好吃,好好吃。”

饱餐完烤肉,我们把戴助理送回家。

晚上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想想大改行的“支援”,越想越不愉快,很晚了才郁郁睡去。

第二机械部是国防工业性质的部,也就是兵工部。当时有1800多人。人员不少,实际上是官多兵也多,机关里人浮于事,上下脱节。古人云:“官吏浮冗,冗员为忌,最为天下之大患。”既然人浮于事,为什么还要从其他单位再要人大改行地来“支援”?难道还嫌喝茶、看报的人少?人多,还要要人,这可真是官僚主义啊!(在我1958年被处理后,1959年这个部整个被撤销,说明我的“此说不虚”)。

由于这个部是保密单位,人员注重政治条件,有不少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原来都是军人,部长赵尔陆原来就是司令员。副部长杨春甫是空军干部部部长……从整体来说,所谓政治条件好的人多,军人和工农干部多,知识分子相对较少。有些干部认为在保密单位工作,有一种自命的优越感,原本文化素质不高,还高高在上,无所事事,这可真是培养官僚主义,养懒汉的所在。

那个时候,把我安排到教育司的干部科。干部科就是人事科。这干部科应该是党员、老干部工作的地方,我是学有专业的,让我搞这份工作算怎么回事?我整天为了学非所用的问题,安心不下来,天天只是应付着工作。每天下了班,从机关所在地-----北河沿大街,走到东华门大街,买两个火烧,一头钻进王府井的新华书店,直到书店关门才回宿舍。

几天后,我去找李承文司长,要求调换工作。李司长说:“你至少得干一年。现在大学专业很多,老干部根本搞不清高教部那本‘专业说明’。分配工作乱来,很多都不对口。专业不对口,等于根本不懂,你教他怎么工作?现在叫你搞‘调整’工作,不对口的找来,你给调整。你把

这份工作搞完，咱再想办法调整工作。”

无可奈何，只好先忍着。

干部科长叶学运，是从军队来的，山东人。人倒满爽朗、随和。有个女同志王向成，是个高中毕业生，老惦记考大学，大概背后一直准备功课，1956年干部科撤销时，她正好考取了人民大学政治系。（后来听说毕业后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书。不幸被癌症夺去了她的性命。）还有一位是河北曲阳山区农村来的杨贵星。听说他是个老党员，干这工作倒也合适。曲阳盛产汉白玉石，石匠很多。北京建筑用的汉白玉石大概相当数量是来自曲阳。

有时候这位杨贵星写了文件让叶学运科长签字。叶常常环顾左右，用他那山东话叨唠：

“这叫什么活儿？这，这，这是什么活儿？！”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科长对老杨的字很伤脑筋。（那时候只有部办公厅才有打字机，更没有电脑）让杨再重写，面子上对杨不好看，就这样发下去，中央一个部教育司的脸又太不好看。所以搞得他很为难。我偷偷过去一看，确实，那字在小学生中排名次的话，恐怕也得倒数。

我在搞这段干部工作期间，因为“童子军”的性质问题，我和杨发生过一次争执。他在看一个人的档案时，说：“这个人够反动的。在孩童时就参加了国民党的外围组织-----‘童子军’”。

我给他解释：“童子军”是英国人倡导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体会到儿童在战时应该懂得简单的防护救治、生活方法、应付环境变化等知识。后来就在小学举办“童子军”，从事野外露营、爬山、渡河等活动。目的是训练他们对非正常情况的应对能力。并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儿童成员。

他却认为我对国民党缺乏正确认识。言外还影射我“思想反动”。从那以后我心想：“这种人社会常识也太少，他要这样作人事工作，这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跟着倒霉，害多少人。”

不久，中南空军要淘汰一批人，希望我们去挑选一些，分到中等专业学校去。叶学运科长派我去武汉。我第一次去武汉，住在空军招待所。我觉得分到兵工性质的中等专业学校，对他们这批有实地操作经验的人来说，还不如这里准备给他们安排的岗位。记得有一位老牌电影明星胡蝶的弟弟，抗日战争中，他从重庆某大学参军，被送到美国学习飞机驾驶，解放以后留在空军。当然不被信任，当时准备安排他到河

北良乡,某空军学校教驾驶飞机。我认为去教驾驶飞机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书要适合。何况他的夫人吕恩在北京工作,周六周日休息,从良乡回北京也非常方便。好在只派我一个人去了,根据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认为二机部要这批人也属于“乱点”,说不定和要我们来“支援”一样。我很干脆地决定全部还由中南空军安排,我们不接受。办完事就回了北京。

【注】书稿已经改完,看了2012年8月16日的《北京晚报》,不再补说几句:

2012年8月15日,人艺老演员吕恩以91岁高龄去世。《北京晚报》于次日报道:“……吕恩原与吴祖光为夫妻。吴和新凤霞结婚后,吕和影星胡蝶的堂弟胡业祥(国民党起义空军)结婚。胡于1968年去世。”读罢这段报道,一则说明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我没有记错;二则感到历史对他们夫妻的嘲弄也太凄凉。胡业祥在日寇侵华时正读大学,当时外敌入侵,作为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出于爱国热忱,毅然“投笔从戎”。他大概没想到,后半生落了个不好受的“起义”结局。吕恩在国民党统治区演过不少“进步话剧”,担过风险。她的“起义”丈夫去世三年之后,她已经退休养老,1971年她被批准成了退休老太中的共产党员。

到了五、六月份,在文艺界忽然发生了“胡风事件”。我也买了一份《文艺报》消遣,那一期还附有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看完了也根本没有重视,我认为这不过是文艺理论的争论,也看得出其中夹有个人之间的不和。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对于文艺界的事毕竟是外行,既没有重视,也搞不清楚。

后来没有料到毛泽东亲自写了《人民日报》披露材料的按语,胡风的问题竟被定为“反革命”。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说:“……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作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的统治为任务的。”

不就是一些左派文学家和周扬闹点意见吗?不就是文艺界的不同



意见争论吗?怎么就全成了特务、叛徒?乃至于要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能扣这么大的政治帽子?我思想上有点想不通。这算怎么回事?这就是政治?

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运动即将到来的时刻,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个新来的“支援者”竟被共产党的支部书记盯上了。有一天下班了,我没有回宿舍,还在办公室看小说。

书记梁心明走进来了。按职务说他是书记兼高教处处长,他不是副司长,更不是司长,除了老在司长办公室耗着,泡着。不知道他天天在哪儿,也不清楚他天天在干些什么工作。

“你还没回去?”他推门走进办公室后问我。

“回去也没事,看看小说。”我一边回答,一边出于礼貌,合拢书本,站了起来。

“胡风你知道吗?”他突然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其实我来以后,从来没见过他看书,我想,要不是最近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关于“胡风集团”的材料,肯定他根本就不知道胡风其人。现在从报纸上知道发生了一个“胡风事件”,凭经验他似乎捕捉到一种政治风向。大概从这事上“能捞到点什么”是他的主导思想。

“知道呵。”

“你怎么知道的胡风?”好象别人都和他差不多,现在知道胡风是件新闻。

“报上天天登,天天看报,谁还能不知道?”

“你看过胡风的书吗?”他又提出了问题。

“没有。”

“你那么爱看书,就没看过胡风的书?”这架势似乎不是随便聊天了,谈话好象“直切主题”,爱看书也成了问题。我不由得注视着他那张瘦长蜡黄的脸,落腮胡子挺重,象在蜡黄的脸上又涂了一层黑色的亚光油彩。目光狡黠而严肃。嘴巴半张,几只黄褐色的长牙不整齐地排列着,半露着。实在说,从这张脸的形象上看,有点儿象旧社会“烟民”的脸。忽然,我下意识地有一种想法——好象来者不是善意。

“梁书记,我们是国防工业部门,不是文艺单位,而且我是学经济的,为什么非要把文艺界的书都看过?”

“你现在看的是一本什么书?”似乎依然不放松,一句紧跟一句。狡黠的目光死盯着我手压着的那本书,好象我会把那本书象变魔术一样